

国民革命与东亚地区的“反帝连带”^{*}

——以韩国志士吕运亨的在华活动为中心

裴京汉

内容提要 从韩国、越南等中国周边的殖民地弱小国家的立场来看,树立了反帝目标的国民革命是一个新的希望。国民革命中的“反帝连带”主张,即共同对抗使韩国、越南沦为殖民地的日本、法国等帝国主义列强的主张,也确实使韩国、越南的革命家们将其视作坚实的友军。详细追溯20世纪前半期韩国最具代表性的政治领袖吕运亨参与国民革命的史实,不仅是为了如实还原吕运亨在中国活动的原貌,也是为了通过重温国民革命时期亚洲各民族间的“反帝连带”的实相和意义,来加深对国民革命的国际形象的理解。吕运亨参与国民革命的初衷,便是希望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后,能借助中国支持而实现韩国独立与革命成功。由此可见,对于吕运亨而言,中国国民革命并非他国之革命,而是祖国韩国之革命。从这一角度来看,作为“反帝连带”现场的国民革命,同时也是同时代东亚地区处在殖民统治下的弱小国家独立运动的阵地。

关键词 国民革命 国民党二中全会 “反帝连带” 中韩互助 吕运亨

一、序言

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的起点。众所周知,国民革命的目标是反帝反封建(反军阀)。在1月23日发表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对中国所处之形势阐述道:“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使得中国丧失独立,陷于半殖民地之地位,而国内军阀又凭借帝国主义列强的庇护使生民涂炭”,因此明确提出以“打倒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为国民党的首要任务。^①

众所周知,“反帝”这一口号虽在辛亥革命阶段就在革命派内被正式提出,但建立在对帝国主

^{*} 本稿曾宣读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孙中山研究会联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一大暨第一次国共合作成立90周年学术研讨会”(中山,2014年11月),得到汪朝光、罗敏、林德政等与会学者的指正,特此表示感谢。

^①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1月2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1—82页。

义正确理解基础上的真正意义上的反帝意识和反帝主张,则是在经历了五四运动以及受到了此后不久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强烈影响后才出现的。^①当然,国民党接受反帝的目标后,在推行的过程中与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方面也发生了不少矛盾与摩擦,而这些矛盾与摩擦成了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国民革命所树立的“反帝”目标,并不仅仅是中国革命独有的课题。当时,亚洲大多数国家皆在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下沦为殖民地,因此“反帝”也是亚洲弱小民族、弱小国家共同的目标。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不久的1月6日,孙中山发表宣言敦促建立“世界弱小民族反帝联合战线”以应对世界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虽然该宣言首先是围绕广东地区关余税款的处理问题展开,这其中也包含着对列强的抗议,但孙中山希望借此宣言强调的却是国民革命的目标“反帝”绝非只是中国一国之“反帝”。从韩国、越南等中国周边的殖民地弱小国家的立场来看,树立了反帝目标的中国国民革命是一个新的希望。国民革命共同对抗使韩国、越南沦为殖民地的日本、法国等帝国主义列强的主张,即“反帝连带”、“反帝联合战线”的主张,也确实使韩国、越南的革命家们将其视为了坚实的友军。在20世纪20年代前半期,韩国舆论曾集中关注过孙中山,这一现象其实是以对“反帝”领袖孙中山之关注来表达当时韩国人在国内所无法表达的“反帝”即反日主张,并以此种方式对孙中山的革命运动表示关注与支持。^②与此相同,当时韩国人对于国民革命时期代表性的反帝运动——五卅运动抱有全面的期待与支持,这也正是因为反帝的五卅运动并非只是中国一国意义上的反帝运动,而是与韩国的反帝运动即独立运动紧密相关的。^③

本文所论人物吕运亨乃是20世纪前半期韩国最具代表性的政治领袖。吕运亨于1914年流亡中国,1929年被日本警察逮捕并遣返韩国,是这一时期在华韩国独立运动最核心的领导者之一,回国后又成了国内独立运动的核心人物。特别是在日本败亡前不久的1944年,吕运亨组建了全国性组织“建国同盟”,准备在韩国独立后建设新国家。日本战败后,吕运亨将建国同盟扩展为建国准备委员会,并因此成为日本战败投降后所谓的“解放政局”中最受瞩目的一位政治领袖。1948年吕运亨遭右翼势力暗杀,其苦心经营的“统一建国”梦也遭破灭。虽然如此,吕运亨提出的以“左右合作”为基础的“中道统合”政治路线在今日尚处于南北对立状态的韩国仍受到广泛的支持。

吕运亨左右合作、中道统合的政治路线,其实是在其在中国的经历,即其曾参加过的以国共联合阵线为基础的国民革命的经历影响下形成的,这一点确实鲜为人知。这是由于关于吕运亨在中国的活动以及其参与国民革命等史实的相关研究尚有许多未尽之处导致的。^④本文详细追溯吕运亨参与国民革命的史实,不仅是为了如实还原他在中国活动的原貌,而且也是为了通过重温国民革命时期亚洲各民族间的“反帝连带”的实相和意义,来加深对国民革命的国际形象的理解。进而希望通过国民革命时期亚洲各民族间的“反帝连带”的理解,对维护当今正处在深刻危机之中的东亚和平与安定做出一定的贡献。

^① 徐义君:《中国共产党对广州、武汉时期国民政府反帝外交的影响与帮助》,《北方论丛》1994年第6期;王健伟:《20世纪20年代国民党“反帝”口号评析》,《安徽史学》2010年第2期。

^② 裴京汉:《瓮刳斗 환곡(孙中山与韩国)》,首尔,冠岳出版社2007年版,第192—211页。

^③ 为了表达对五卅运动的支持,当时在韩国曾有人计划在孙中山去世100日时举行纪念追悼会,但由于日本警察的镇压而失败。参见裴京汉《瓮刳斗 환곡(孙中山与韩国)》,第205—210页。

^④ 关于吕运亨与国民革命的关系,日本的韩国近现代史学者水野直树已有过先驱性研究。水野直树虽然发表过一些论文,论及本文详述的吕运亨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始末和在二全大会上发表“反帝连带”演说的重要史实,但他是以吕运亨与孙中山的关系为焦点加以说明的,而对本文中着重论述的吕运亨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以及作为共产国际相关活动一环的“反帝连带”却未有涉及。见水野直树《吕运亨と中國國民革命——中國國民黨二全大會におけるをめぐつて演説》,神户《朝鮮民族運動史研究》8(1992),第35—63页。

二、向共产国际靠近

吕运亨于1886年出生于京畿道杨平,早在朝鲜王朝亡国危机逼近的1906年,便开始积极参与国债报偿运动、教育运动等国权恢复运动。^①吕运亨留学南京则是在朝鲜王朝灭亡、韩国沦为日本殖民地后的1914年9月。作为基督教徒的吕运亨,留学的本是学习神学,但由于金陵大学没有神学专业而转学英文,1917年毕业。毕业后,吕运亨马上转赴上海,就职于美国人经营的协和书局(Mission Book Company),同时成为上海地区韩人独立运动的核心领袖。^②1929年7月,吕运亨被日本警察逮捕并被强行遣返韩国。

吕运亨在上海的独立活动大体可分为两个方向面。一是组织居住于上海的韩人成立侨民团体并创立韩人学校等,为上海韩人社会奠定独立运动的基础^③;二是通过向巴黎和会派遣代表、向访华的美国议员团宣讲韩国独立的正当性等外交宣传手段开展独立运动。^④吕运亨的国际宣传活动起初是以西方列强为对象开展的,但在1919年末或1920年初开始慢慢转向苏俄和共产国际。吕运亨转向俄国和共产国际,虽然与其对马列主义的思想性探索和接触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原因应是其认为与俄国和共产国际的接触对独立运动更加有利。后来吕运亨本人也曾说过,“我个人虽也信奉马克思主义,但在韩国进行阶级斗争却是不可行的”,“我之所以参加共产主义运动并非是为了阶级与党派,而纯粹是为了民族的独立与幸福”^⑤,这也是可以佐证的。

吕运亨向俄国和共产国际靠拢的背景,是从1919年末开始,俄罗斯与共产国际正式推行支持世界革命的政策。众所周知,共产国际对殖民地弱小国家的基本政策,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须与资本家阶级的民族运动势力组成联合阵线,以实现民族解放,其理论基础乃是《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⑥由此看来,1919年韩国发生全国性反日运动(三一运动)后不久在上海成立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为共产国际的主要支持对象也是当然之事。1919年12月来沪的波达波夫(A. S. Potapov)虽然不是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但是却作为苏俄政府实际代表与时任临时政府国务总理的李东辉、时任劳动督办但实际统揽临时政府的安昌浩等临时政府要员们进行接触,这也是共产国际支持韩国临时政府所做的第一阶段的探索。结果,1920年4月韩亨权作为临时政府的代表拿着波达波夫的信任状被派遣至莫斯科,并从莫斯科得到一笔数额可观的经费。^⑦

当时吕运亨虽被提名为派遣到莫斯科的代表之一,但由于临时政府内部的意见冲突而未能成行。但是1920年4月底到5月初,吕运亨在福建漳州参加了与波达波夫和陈炯明的三方会谈,吕运亨希望通过与俄罗斯的合作而得到其对临时政府的援助,这一努力也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在此

① 吕运亨:《自叙傳 1-11의 青年時代(我的青年时代)》,梦阳吕运亨先生全集发刊委员会编:《夢陽呂運亨全集》第1卷,首尔,한울出版社1991年版,第26—27页。

② 吕运亨:《自叙傳 2-11의 上海時代(我的上海时代)》,《夢陽呂運亨全集》第1卷,第28—29页。

③ 关于上海地区韩人团体上海高丽亲睦会与其管下的仁成学校,参见金光载《日帝时期 上海 仁成學校의 設立及 運營(日帝时期上海仁成学校的设立与运营)》,首尔《東國史學》50(2001)。

④ 吕运亨创立的新韩青年党在1919年2月初派遣以金奎植为代表的巴黎和会代表团前往巴黎,但是未能参加和会,所以只能针对各国代表团进行宣传。关于新韩青年党的成立与赴巴黎和会代表团的派遣,参见慎镛履《新韓青年黨의 獨立運動(新韓青年党的独立运动)》,首尔《韓國學報》12—3(1986)。

⑤ 《(警察)被疑者訊問調書(第2回)》,《夢陽呂運亨全集》第1卷,第416、443页。

⑥ 《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2页。

⑦ 林京锡:《韓國社會主義의 起源(韩国社会主义的起源)》,首尔,历史批评社2003年版,第190—191页。

次漳州会议上,波达波夫与陈炯明形成了“俄罗斯援助在广东创办军官学校和兵工厂并提供海参崴的武器”等决议,值得注意的是,这与之后第一次国共合作过程中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援助如出一辙。^①另外关于韩国独立问题,漳州会议上议定“由俄罗斯援助在西伯利亚地区建立韩人军官学校并培养韩人部队,陈炯明方面负责对其财政援助”,这对于成立翌年正处于严重财政危机中的韩国临时政府而言实为一个新的机会,具有重大的意义。^②

吕运亨加入上海的韩人共产主义集团是在漳州会议后不久的1920年5月,这应是由于其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所致。首先是维经斯基(G. Voitinsky)受俄罗斯共产党远东部派遣抵沪,随后,一直在海参崴活动的韩人共产党员金万谦也被派遣至上海^③,他们的任务是为搞活中国、韩国、日本的共产主义运动而在上海成立共产国际东亚秘书部。1920年5月在上海成立的韩人共产党便是对应共产国际东亚秘书部高丽部的组织,吕运亨也是在和金万谦与维经斯基会面后加入韩人共产党的。^④据吕运亨所言,当时维经斯基表示“工农俄国将竭力支持韩国独立,现在上海已(在俄罗斯援助下)成立高丽共产党,(如欲进行独立运动)与共产党合作方是上策”,并劝其入党,吕运亨回应道,“但凡有助于韩国之独立,无论其为何人都愿与之携手,所以同意入党”。^⑤

韩人共产党即高丽共产党是在维经斯基和金万谦抵沪之前便已存在的、由少数成员组成的“共产主义组织”扩大改编而成的组织。这个“共产主义组织”便是最早的韩人社会主义政党——韩人社会党,该党1918年创立于俄国哈巴罗夫斯克,成员有李东辉、金立、李翰荣、金万谦等。这些韩人社会党出身的人士在临时政府成立时期都曾来上海参与过临时政府。此后随着吕运亨和赵东祐、赵琬九、申采浩等上海地区独立运动领袖的入党,该“共产主义组织”正式扩充改编成韩人共产党(或高丽共产党)。^⑥吕运亨在韩人共产党中与李东辉、金立、李翰荣、金万谦、安秉瓚、赵东祐共同担任中央委员,并负责翻译部事务。^⑦

吕运亨参加1922年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被压迫民族代表大会乃是首次与共产国际接触。远东被压迫民族代表大会是为了应对同时期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以西方列强为中心的华盛顿会议而召开的,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将共产国际对中国、韩国、日本、蒙古、爪哇等亚洲(远东)地区弱小民族的援助具体化。吕运亨以韩人共产党代表的身份,与金奎植等50余名韩人代表一起参会。他积极参与大会活动,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⑧据吕运亨后来回忆,早在1921年秋,他就被委任在上海和天津筹备此次会议,亲自负责韩中日三国以及蒙古、爪哇代表们赴莫斯科的护

① 参见李丹阳、刘建一《英国档案所见苏俄与孙中山及国民党的联系》,台北《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31期,2001年。

② 裴京汉:《漳州會議(1920년4—5월)과 呂運亨 -한중러연대 모색과 그 의미(漳州会议与吕运亨——韩中苏三国连带的搜索与其意义)》,首尔《歷史學報》220(2013),第177—180页。

③ 关于此时期金万谦的活动及其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参见尹相元《1920年代初半러시아의 韓人 社會主義者들과 金萬謙의 活動을 중심으로(1920年代初在苏韩人社会主义者们与东道国——以金万谦的活动为中心)》,首尔《歷史研究》16(2006)。

④ 潘炳律:《呂運亨의 活動을 통해 본 上海地域 초기 韓人 共產主義組織의 형성과 變遷에 대한 再解析, 1919—1921(通过吕运亨的活动看上海韩人共产主义组织的形成与变迁及其再解析, 1919—1921)》,天安《韓國獨立運動史研究》45(2013)。

⑤ 《檢察訊問調書(1929. 8. 2)》,《夢陽呂運亨全集》第1卷,第480页。

⑥ 潘炳律:《呂運亨의 活動을 통해 본 上海地域 초기 韓人 共產主義組織의 形성과 變遷에 대한 再解析, 1919—1921(通过吕运亨的活动看上海韩人共产主义组织的形成与变迁及其再解析, 1919—1921)》,《韓國獨立運動史研究》45(2013),第212—227页。

⑦ 吕运亨在后来被警察侦讯时说自己负责翻译部、赵东祐负责出版部,并在供述时伴作自己并非中央委员。((《高等警察意見書(1929. 7. 29)》,《夢陽呂運亨全集》第1卷,第453—454页。)但其实他应该是作为中央委员负责翻译之事的。

⑧ 关于参加远东被压迫民族代表大会的韩国代表团的选拔与派遣,参见林京锡《極東民族大會의 朝鮮代表團(远东民族大会与朝鲜代表团)》,首尔《歷史의 現實(历史与现实)》32(1999)。

照办理工作。由此可见,早在远东被压迫民族代表大会的准备阶段,吕运亨便是此次大会的核心成员了。^①

远东被压迫民族代表大会经过对劳动、农民、青年、民族、妇女等问题的讨论,通过了指示整体革命运动方向的决议案。大会认为韩国“工业尚未发达,阶级意识尚处低阶段,因此阶级运动为时尚早。(所以)共产主义活动家应支持民族运动即独立运动”,与此相应,“(现在的独立运动中心机构)临时政府有必要进行改组(改组为共产主义活动家可以合作的组织)”。这些政策如实地反映了亲自参会的列宁的基本立场。列宁对东亚共产主义运动一一提出了援助政策,即在中国与国民党合作,在日本进行议会运动,至于韩国,则提出了对临时政府进行援助的政策。^②

1923年1月至5月在上海召开的国民代表会议,虽然有解决因临时政府总统李承晚和国务总理李东辉之间的矛盾而产生的严重的内斗问题的意图,另一方面也是试图响应远东被压迫民族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改组临时政府的要求。1920年以来深陷财政困境的临时政府为维持组织运转,确保共产国际的援助比任何事情都重要。吕运亨与安昌浩等人一起积极筹划改组临时政府的国民代表会议运动,但由于围绕着临时政府的“改革”的程度问题,改组派与创造派之间产生内讧,致使努力了数月的国民代表会议运动以失败告终。^③

围绕着莫斯科所提供援助的分配问题也产生了矛盾和内讧。种种原因导致韩人社会主义者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化,甚至使韩人共产党再次分裂为上海派和伊尔库茨克派。韩人社会主义势力间如此激烈的内斗也是导致共产国际很难对临时政府进行援助的决定性因素。^④在韩人共产党内斗过程中加入伊尔库茨克派的吕运亨在1925年5月开始正式投身中国革命,这其中虽也有接受共产国际安排的原因,但另一方面也应是其对临时政府和韩人共产党的内斗状态甚感失望所致。^⑤

综上所述,1917年以后上海地区独立运动的核心人物吕运亨在1919年底或1920年初开始急向共产国际靠拢,是因为共产国际切实的援助方案,是以深陷内斗与财政困境的临时政府为中心搞活独立运动,但无疑也是对共产国际制定的通过对殖民地弱小国家民族运动的支持来鼓舞全世界革命的所谓的“联合阵线”政策进行呼应的结果。

三、出席国民党二大并发表“反帝连带”演说

与其他流亡中国的韩人志士一样,吕运亨对中国革命的关注也应是在其流亡之初产生的。当时许多韩人志士已无法在国内进行独立运动,遂谋求流亡海外,其中大多数流亡到了中国,尤其是在韩国被日本强并、朝鲜王朝灭亡后不久的1911年10月爆发的武昌起义,引发了韩国志士集体性流亡中国的现象。中国与韩国不仅在地理上和上都最为接近,中国共和革命胜利的消息又为

① 吕运亨:《나의回想記(我的回忆)》(一),首尔《中央》1936年3月号。该回忆录曾在《中央》月刊刊载5期,记录了吕运亨为参加远东被压迫民族代表大会而从上海至天津,经张家口、库伦(乌兰巴托)、西伯利亚而抵达莫斯科期间的旅程。

② 《警察訊問調書(1929.7.18)》、《被告人訊問調書(第2回,1930.2.27)》,《夢陽呂運亨全集》第1卷,第413、563—564页。

③ 金喜坤:《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研究》,首尔,知识产业社2004年版,第351—359页。

④ 关于早期韩人共产主义团体的组织与分派,参见潘炳律:《呂運亨의 活動을 통해 본 上海地城 초기 韓人 共產主義 組織의 형성과 변천에 대한 再解析, 1919—1921(通过吕运亨的活动看上海韩人共产主义组织的形成与变迁及其再解析, 1919—1921)》,《韓國獨立運動史研究》45(2013),第232—240页。

⑤ 据吕运亨所言,他直接参与到中国革命中是在孙中山去世以后的1925年开始的。《(檢察)被疑者訊問調書(第3回, 1929.8.2)》,《夢陽呂運亨全集》第1卷,第484页。

流亡中国的韩人们指明了独立与建国的新方向。^①

吕运亨对中国革命的关注,可以通过其与中国革命领袖孙中山的频繁交流来确认。吕运亨于1916年通过曾是《字林西报》记者的陈汉明的介绍初次会见孙中山,他对孙中山的第一印象是冷淡且傲慢。但是在1918年11月,为派遣韩国代表赴巴黎和会事,吕运亨通过徐谦的介绍再次会见孙中山以后,对他的印象完全改变了。孙中山在款待吕运亨时不仅将夫人宋庆龄介绍给他,并且还帮助他作为南方政府代表被派遣至巴黎和会的代表伍朝枢、陈友仁等人相协调。之后吕运亨便不时造访孙中山在上海莫利爱路的私邸,与之共商韩国独立与革命的方案,结果两人成了甚为亲密的好友。^②

吕运亨与孙中山最后一次会面是在1924年11月孙中山北上途经上海之时。听闻孙中山抵沪的消息后,吕运亨到码头迎接,并一起到孙中山私邸会谈了数小时。吕运亨见到孙中山白发增多,便道:“先生头发虽变白,但革命却越发红火了”,孙中山答道:“人的头发是越老越白,可革命却是越老越红火”。^③后来吕运亨在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进行演说时,开头便说了这段轶事^④,可见这句话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与其他许多韩国人一样,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的消息对于吕运亨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⑤

根据吕运亨的法庭陈述,他在孙中山去世一个月后的4月12日参加了在上海西门外公共体育场举行的上海各界人士追悼大会,并再次通过宋庆龄的介绍见到了鲍罗廷的夫人。^⑥鲍罗廷夫人一面嘱托吕运亨投身正在发展中的中国革命事业,一面又为吕运亨写了给驻北京苏联大使加拉罕(Lev Mikhaylovich Karakhan)的介绍信。^⑦加拉罕向吕运亨咨询了他对张作霖、冯玉祥、吴佩孚以及国民党的看法,吕运亨回答道,张作霖与吴佩孚虽势强,但无任何合作可能性,与冯玉祥合作虽有可能,但与国民党合作并对其进行支持才是明智之选。加拉罕说工农政府的意见也是如此,同时还说革命家是没有“祖国”的,韩国的独立与革命运动由于极深的内斗是无法成功的,所以他要求吕运亨投身于中国革命,待到中国革命成功后韩国的解放也自然会实现。加拉罕还拜托吕运亨担任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以及苏联三者之间的联络工作。^⑧接受了这一委托的吕运亨在返回上海后会见了苏联驻上海副领事维特^⑨,并接受了塔斯社的任命,将刊载于中国各大报纸上的有关战争、政治、共产主义运动、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的报道翻译成英文并发给维特。^⑩

① 裴京汉主编:《동아시아 역사 속의 신해혁명(东亚史上的辛亥革命)》,首尔,한울出版社2013年版,第22页。

② 李万珪:《呂運亨關學史》,夢陽呂運亨先生全集發刊委員會編:《夢陽呂運亨全集》第2卷,首尔,한울出版社1991年版,第287—288页。

③ 《孫中山先生の十週忌日 當りや - 印象깊은 追憶의 一節(紀念孫中山先生十週忌日:印象深刻的一節追憶)》,《夢陽呂運亨全集》第1卷,第129—130页。

④ 《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記錄(第九日第十七號)》(1926年1月14日),《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上),第301页。

⑤ 关于当时韩国人对孙中山的北上与发病、去世的莫大关注,参见裴京汉《空國斗 한구(孙中山与韩国)》,第192—211页。

⑥ 宋庆龄在北京治丧结束后于4月11日返回上海,12日参加上海各界人士追悼大会。尚明轩主编:《宋庆龄年谱长编(1893—1948)》,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第203页。

⑦ 据日方情报,1924年8月末吕运亨前往北京与苏联大使加拉罕会面并商议临时政府接受苏联援助之事。《呂運亨ノ行動二關スル件(1924.9.4)》;《在上海不逞鮮人呂運亨ノ北京行卜其用務二關スル件(1924.9.12)》,《國外抗日運動資料:日本外務省記錄(國史編纂委員會 韓國史)》Database, <http://db.history.go.kr/>。吕运亨则否认1924年曾面见加拉罕的事实(《警察訊問調書(第4回,1929.7.22)》,《夢陽呂運亨全集》第1卷,第430页)。如果吕运亨在1924年真的会见了加拉罕,那就说明在1925年4月鲍罗廷夫人给他介绍加拉罕之前,他已经与加拉罕有过交流。笔者认为,吕运亨在庭审时的陈述不足取信。

⑧ 《警察訊問調書(第6回,1929.7.29)》,《夢陽呂運亨全集》第1卷,第460页。

⑨ 吕运亨用韩语表述为维特(베르테)的苏联驻上海领事馆副领事的正确俄语姓名和履历现已无从确认。

⑩ 吕运亨的酬劳是每月200元。《警察訊問調書(第6回,1929.7.29)》,《夢陽呂運亨全集》第1卷,第460—461页。

吕运亨说自己的任务只有塔斯社所托的翻译中国新闻报道一事,但此时期他的真正任务却不局限于此。加拉罕通过维特使吕运亨为塔斯社效力是解决其“生计”问题,更重要的目的则是赋予其在国民党、共产党以及苏联之间居中联络之任务。吕运亨说自己开始投身中国革命是在1925年5月,就在此后不久,上海爆发了五卅运动,当时吕运亨每日与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共产党代表瞿秋白、苏联驻上海副领事维特探讨对策;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时,他与主导会议的汪精卫、鲍罗廷一起(即使并非正式会议)就大会的基本方针进行探讨;并且在1927年国民革命军进入上海之前,直接参与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筹备工作。^①所以,吕运亨已经深度介入了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之间的协调工作。如果吕运亨所言属实,那么,其所提及的上述活动则很有可能是受命于在上海成立的共产国际东亚秘书部。

1926年1月初,吕运亨离开上海前往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此前,他曾数次访问广州。据吕运亨所言,邀请自己参会的是全面负责二全大会筹备工作的汪精卫。^②1921年以后,在中国各地成立了中韩连带组织,汪精卫是这些组织之一的中韩协会的成员^③,而吕运亨则是统控这些中韩连带组织的中韩互助总社的主要成员之一。^④因此汪精卫有可能与吕运亨熟识,并因此邀请他参会。但是,吕运亨名义上虽为汪精卫所邀请,实际的邀请者却更可能是二全大会的实际主导者鲍罗廷。^⑤正如上文所述,1925年以后吕运亨的活动集中转向共产国际,其基本活动很有可能受命于共产国际,不仅如此,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吕运亨还与汪精卫、鲍罗廷一起在鲍的公馆聚会,为二全大会制定基调。由这些方面来看,吕很有可能是受鲍罗廷的安排和邀请而参会的。^⑥

根据日方的情报,吕运亨于1月10日离开上海,1月25日返回。^⑦考虑到上海到广州之间的距离,吕运亨说自己在全体会议演说当天即1月14日上午才到达广州应是属实的。^⑧由此看来,包括吕运亨在内的3名外国代表的演说很有可能并非事前安排好的,而是临时决定的。^⑨

1月14日上午的全体会议上,外国演讲代表包括吕运亨在内共有3名。首先演讲的是越南的

① 《檢察訊問調書(第3回,1929.8.2)》,《夢陽呂運亨全集》第1卷,第484—485页。此外如后文所述,与吕运亨一同作为演讲者被邀请的越南代表胡志明也受到了共产国际的派遣,来到鲍罗廷麾下负责中国各种新闻报道的翻译工作并负责发送给共产国际。胡志明同时也在进行越南共产党的创党准备工作,在这点上吕运亨与胡志明有着相同的作用,所以很有可能都是隶属于共产国际的活动家。

② 《警察訊問調書(第3回,1929.7.20)》,《夢陽呂運亨全集》第1卷,第427页。

③ 1921年9月至10月间韩国临时政府总理申圭植访问广州护法政府并在广州成立了中韩连带组织中韩协会。关于中韩协会的组织与活动,参见裴京汉《선원회 환국(孙中山与韩国)》,第75—83页。

④ 中韩互助社1921年3月在长沙首先成立,随后在安徽、汉口、上海等地陆续成立,其统控组织中韩互助总社于1921年5月在上海成立。参见李永春《长沙中韩互助社述论》,《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6期;康基柱《中韩互助社研究》,首尔《亚细亚文化研究》2(1997);裴京汉《선원회 환국(孙中山与韩国)》,第76—79页。

⑤ 张国焘认为,二全大会实际上是在鲍罗廷的指导下召开的,汪精卫只不过是鲍罗廷的代理人而已。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卷,香港,明报出版社1974年版,第81—82页。

⑥ 《警察訊問調書(第3回,1929.7.20)》,《夢陽呂運亨全集》第1卷,第427页。

⑦ 《廣東二於ケル呂運亨ノ行動ニ關スル件(1926.2.6.)》,《國外抗日運動資料:日本外務省記錄(國史編纂委員會 韓國史)》Database, <http://db.history.go.kr/>。此日程与吕运亨所说自己当时在广州停留了一个月之久〔《警察訊問調書(第3回,1929.7.20)》,《夢陽呂運亨全集》第1卷,第427页〕的说法有一定的差距。

⑧ 吕运亨在大会演说的开场白部分说道:“由于刚刚到达没能准备好中文演讲,不得已只得用英语演讲。”《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九日第十七号)》(1926年1月14日),《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301页。

⑨ 会议主席汪精卫在会议开始时说道:“原定议事日程有变,我们来听一听外国革命家的演讲怎么样?”从汪精卫的口吻可以看出,这些演讲原在议事日程中并无安排,而是临时被安排进来的。《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298页。

革命领袖胡志明,其次是韩国的吕运亨,最后是印度的哥巴。^①当天上午的会议从10点20分开始,12点30分结束。3位代表演讲之后,由陈公博作廖仲恺遭暗杀事件的处理报告,之后是提问和讨论。^②由此推测,每位演讲者的演讲时间应不会超过20分钟。

会议上被以王达人之假名介绍的胡志明在辛亥革命爆发后的1911年末赴法国,此后在国外从事了30余年的革命活动,是越南具有代表性的革命家。1920年胡志明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后,随即加入了刚刚成立的法国共产党。他于1924年初前往莫斯科成为共产国际活动家^③,同年11月被共产国际派赴广州,名义上的职位是鲍罗廷的中文翻译。但是胡志明在广州的活动却非翻译那么简单,他住在鲍罗廷公馆时期,一面翻译中国报纸的主要新闻发送给共产国际,另一方面也在着手进行越南共产党的创党准备工作。胡志明到达广州时,在广州已有推进越南独立运动的组织,即以潘佩珠为中心的越南国民党和暴力革命组织心心社。胡志明以上述组织中的进步青年为中心,在1925年6月创立了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众所周知,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乃是越南共产党的前身。这样说来,胡志明在广州的主要活动,实际上就是为创立越南共产党而做准备工作。^④

另一方面,胡志明在广州也曾积极参与国民革命,尤其是在1925年6月以讲演队员的身份积极参与了在广州爆发的反帝工人运动省港大罢工。胡志明向罢工劳动者发表了题为《中国劳动者与被压迫民族之关系以及联合打倒帝国主义之必要》的演说。胡志明在演说中指出,以英帝国主义为目标的此次省港罢工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反帝运动有着共同的目标,因此中国劳动者们应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⑤胡志明提出以反帝为目标的中国国民革命须与越南等殖民地弱小国家的反帝民族独立运动相联合,也可以认为国民革命对胡志明而言乃是实践反帝联合路线的战场。^⑥

二全大会上胡志明是用法语做的演说,为其做翻译的是第二军党代表李富春,演说的内容被较为详细地记录在二全大会的会议录中。胡志明的演说内容大致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揭露了越南在沦为法国殖民地后60年间法国对其进行残暴统治的事实。胡志明说法国统治的最大危害是人民须负担诸如人丁税、房屋税、货物税等过重的赋税,其恶果便是使越南人民贫穷,经济疲敝,大部分土地和企业皆由法国人独霸。而且,揭露法国统治毒害的言论、出版自由皆被剥夺,教育与文化也被彻底地控制。

胡志明演说的第二部分是强调越南人民的独立运动须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相联合。胡志明表示,法国统治者惧怕中国革命的发展,孙中山去世时法国统治者拒绝了越南人民进行追悼的要求。他还表示,法国帝国主义者(为继续对越南的统治)反对中国革命,并正在向广州政府进行攻击。

① 胡志明以假名王达人、吕运亨以假名吕光被介绍。印度人哥巴究竟是谁尚不清楚,不过据推测有可能是当时以日本和中国为中心活动的印度独立运动家 Mahendra Pratap(1886—1979)。参见《印度阿扶加尼獨立運動》(一)(二),首尔《東亞日報》,1925年7月25、26日,均第1版;《쁘라담氏動靜(普拉塔普氏动向)》,《東亞日報》,1928年2月18日,第1版等。

②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304—310页。

③ Jean Lacouture, *Ho Chi Minh: A Political Biography*, Trans. Peter Wil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 pp. 33—47; 裴京汉:《越南初期共產主義運動에 對하여 - 胡志明의 活動을 中心으로 - (越南的初期共产主义运动——以胡志明的活动为中心)》,《서울(首爾)大學東洋史學科論集》4(1979); 刘仁善:《胡志明과 베트남의 共產主義, 1925—1945 - 共產主義의 初期受容過程(胡志明与越南共产主义, 1925—1945——初期共产主义接受过程)》,春川《아시아문화(亞洲文化)》7(1991)。

④ 阮文俊:《胡志明在广州的革命活动及其对越南革命的意义》,《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12年第1期,第124—125页。

⑤ 《安南人加入讲演队》,《工人之路》,1925年7月14日(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等编:《胡志明与香港》,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44页)。《工人之路》是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机关报(周刊),当时胡志明使用了“李瑞”这个假名。

⑥ 阮文俊:《胡志明在广州的革命活动及其对越南革命的意义》,《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12年第1期,第125—126页。

在结论部分,胡志明提出埃及、摩洛哥、叙利亚、越南以及中国等作为处境相同的被压迫民族,同处于帝国主义的压迫之下,须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①综上所述,胡志明演说的焦点便是在国民革命的最大目标“反帝国际连带”上。

胡志明演说之后便是被以吕光之假名介绍的吕运亨的英语演说,翻译人员身份现已无从稽考,但当时的演说译稿也同样被保存在二全大会的会议记录中。^②该演说的内容大致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追忆了自己与革命领袖孙中山和列宁见面时的一些轶事,以表达对两位领袖的思慕之情。吕运亨首先提到了自己与孙中山的友谊,尤其是1924年11月孙中山北上途经上海时,吕运亨见孙中山鬓增白发,便道“先生白发增加,身体也不若从前,但是革命事业却是日益旺盛起来了”,孙中山答道,“如果我们的革命工作不能日益旺盛那便不是革命了”。^③接着又提及1922年1月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被压迫民族代表大会时与列宁会面时的一段轶事。当时列宁向与会的日本代表问道:“你愿意牺牲自己帮助朝鲜来打倒日本的帝国主义吗?”日本代表答道“当然是的”,吕运亨遂接道:“愿一切真正的民族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不和他们合作。”另外吕运亨还讲到当时列宁对参会的中国代表张国焘说:“我深信中国和朝鲜的友善是不成问题的,你们决计能够统一起来,共同打倒帝国主义”,借以强调中韩友谊。^④

吕运亨演说的第二个主题强调打倒帝国主义和资本家是共同的目标,为此中国与韩国等被压迫民族须联合起来。吕运亨还指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便是当今世界革命的发动机,并主张三民主义应成为世界革命之道路。但是反革命力量为扩张其势力范围也在倾尽全力,英国与日本等帝国主义列强互相联合并资助中国国内军阀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因此,中国、韩国等所有革命力量须齐力联合,打倒这些帝国主义列强和军阀,只有这样,世界革命才能具备稳固的基础。^⑤

吕运亨演说的第三部分提到了殖民地韩国的悲惨状况。吕运亨讲到韩国革命始自(三一运动爆发的)1919年,当时是由部分知识分子进行的革命运动,但后来逐渐发展,现已成为全民参与的革命活动。吕运亨还指出:“韩国农民的比重要远大于工人,但是与以往不同的是现在日本帝国主义通过对农民经济压迫来统治韩国,这也反映了当今世界帝国主义压迫方式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在韩国成立东洋拓殖会社这样大规模的公司,借此购入大部分的耕地。结果导致了农民只拥有全国20%左右的土地,完全陷入经济贫困状态,有许多人流落到中国等国家。流落国外的人们与国内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等一起创建了一个组织,也正是基于如此意义可以说最近韩国越来越接近全民革命时期了。”吕运亨还提出,应将弱小民族的解放和独立作为共同目标,因此中国革命的成功便是世界革命成功的一半,也是韩国人的希望。^⑥借此积极提出“反帝连带”与中韩互助的必要性。

①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298—301页。

② 翻译者姓名无从确认。后来吕运亨称此次演说的题目是《中国国民革命的世界使命》,演讲持续了约一个小时。《感謝으로서 한 余의 演說 - 廣東서 國民黨大會 叫에(感谢中的我的演说——在广东国民党大会)》,《夢陽呂運亨全集》第1卷,第87—88页。

③ 前面已经指出,这个内容与十余年后的1935年吕运亨回忆的内容有所差异。但当日的翻译人员翻译错误也是有可能的。《孫中山先生의 十週忌를 當하야 - 印象깊은 追憶의 一節(纪念孙中山先生十周年忌日:印象深刻的一节追忆)》,《夢陽呂運亨全集》第1卷,第129—130页。

④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九日第十七号)》(1926年1月14日),《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301—302页。

⑤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九日第十七号)》(1926年1月14日),《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302—303页。

⑥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九日第十七号)》(1926年1月14日),《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303—304页。

吕运亨之后印度代表用印度语演说,但由于大会未能安排翻译,其演说内容并未被收入会议记录。从胡志明与吕运亨的演说内容来看,印度代表的演说内容大致也应是处于英殖民统治下的印度国民的艰难处境与争取印度独立的努力,另外,为打倒帝国主义,弱小殖民地国家须加强联合,以及对国民革命的支持等等。^①

胡志明与吕运亨演说的核心内容,即为打倒帝国主义,各殖民地弱小民族须进行联合的主张,实际上也是国民党二全大会的核心议题,且是国民革命最亟须解决的问题。这一点在大会首日汪精卫的欢迎词中已有充分体现,汪精卫主张国民党改组和国民革命的目标是“唤起民众”和“打倒帝国主义”。^②同日,在以二全大会名义发给各方的电文中,也包含了发给全世界各被压迫民族的电文。电文强调,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民族运动)与先进国家被压迫阶级的解放运动(阶级革命运动)具有连锁关系,而中国国民革命乃是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③另外,关于国民党的对外政策,二全大会提出联合苏联、联合其他弱小民族以及联合全世界革命民众三个基本方针。^④1月13日通过的二全大会宣言也主张,中国的出路是对外打倒帝国主义,对内打倒所有充当帝国主义工具的官僚、军阀、买办阶级、土豪,为此须与全世界所有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构筑联合阵线。^⑤综上所述,“反帝连带”是国民革命的最大目标之一,同时也是胡志明与吕运亨所代表的殖民地弱小民族革命活动家们的共同目标。

二全大会宣布的这一“反帝连带”主张,实际上已随着国民革命的开始而展开。为支持当时最大的反帝战场——省港罢工,1925年7月在广州成立了被压迫民族联合会,树立了国际“反帝连带”这一基本目标。^⑥被压迫民族联合会是在国民党的全面支持下成立的,总管会务的首任总务部长便是国民党左派的核心领袖廖仲恺,而在廖仲恺被暗杀后,汪精卫出任了这一职务。^⑦根据当时的相关新闻报道,被压迫民族联合会有中国、越南、朝鲜、印度等国的代表参与。虽然吕运亨是否直接参与其中已不得而知,但胡志明明确曾加入并积极参与了其活动。综上所述,二全大会所提出的国民革命的最大目标之一——“反帝连带”,在一全大会以后尤其是省港罢工以后,已成为国民革命最核心的主张之一,而被压迫民族联合会的成立则代表着这一主张进入了实现阶段。

四、中韩互助与支援北伐

据日本方面的情报资料,1926年1月吕运亨在广州的活动不只参加二全大会这一项。日方资料显示,1月14日至25日前后,吕运亨在广州期间通过时任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室副官的韩人孙斗

^① 二全大会会议录中说,“印度革命同志哥巴清演说,但因印度语无人翻译,故不能详记其事,但大意谓‘希望中国革命成功,然后联合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起来共同奋斗’”。《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九日第十七号)》(1926年1月14日),《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上),第304页。

^② 《主席汪精卫先生之欢迎词》,《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147—149页。

^③ 《致电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表示一致奋斗》,《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192页。

^④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八日第十六号)》(1926年1月13日),《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上),第294—295页。

^⑤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八日第十六号)》(1926年1月13日),《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上),第432—449页。

^⑥ 《被压迫民族宣言》,《工人之路》,1925年7月9日,转引自《胡志明与粤港》,第45页。

^⑦ 《被压迫民族联合会会议纪》,《工人之路》,1925年9月13日,转引自《胡志明与粤港》,第46页。

焕的介绍会见了校长蒋介石^①，与之就韩人青年入学黄埔军校问题进行了商讨。^② 吕运亨返回上海后不久，“广东军事政治学校已决定接收朝鲜学生入校并向吕运亨发送了公文要求其召集朝鲜学生，眼下吕运亨正在着手召集朝鲜学生”。^③ 这印证了吕运亨拜访蒋介石时所商讨的主要事项便是韩人学生的入学与招募问题。

众所周知，黄埔军校作为第一次国共合作中最重要的阵地，乃是国民革命的实际出发点。1924年6月在苏联方面全面的财政、军事支持下创立的黄埔军校，不仅为欲通过东征和北伐而统一被军阀割据的中国的国民革命发挥着摇篮的作用，同时也成了弱小民族间“反帝连带”的基地。因此大量的韩国人和越南人进入黄埔军校，一方面可以为韩国和越南的独立运动培养人才，另一方面黄埔军校也是韩国、越南革命志士参与国民革命、支持中国革命的一条通道。^④

当时韩人入学黄埔军校有几种途径，有的是通过如陈果夫等与韩人关系密切的国民党人士入学，有的是通过朝鲜义勇队等关内地区的独立运动团体入学，也有些则是通过吕运亨、赵素昂、朴赞翊等上海临时政府要员的个人协助入学的。^⑤ 韩人能够入学黄埔军校，很有可能是对黄埔军校的运营有决定性影响力的共产国际授意的，即很有可能是作为实现殖民地弱小国家的独立运动须与共产革命相联合的世界革命政策的手段。共产国际促进韩人入学黄埔军校并赋予吕运亨一定的任务。但是另一方面，韩人入学黄埔军校也可以看作广东国民政府对韩国临时政府的一种援助。综上所述，韩人入学黄埔军校以及此后参加北伐军，可以看作是从辛亥革命阶段开始的正式的“中韩互助”的一种实践。^⑥

韩人入学黄埔军校是从1925年6月第三期生开始的，三期生的同学名单中共有韩人学生5名。1926年3月入学的四期生中韩人学生的数字有大幅增加，可以确认的共有24名。四期生中韩人学生之所以大幅增加，主要是因为最具代表性的武装独立运动团体义勇队团长金元凤等团员的大举入学。^⑦ 韩人学生最多的是正处于北伐进行中的1926年11月入学的五期生，有证言说在五期生中韩人学生的数量已有100余名，但是这其中毕业的学生却只有6名，主要原因是1927年4月发生了四一二政变，许多韩人学生离开或被驱逐出了黄埔军校。^⑧ 在这些韩人学生中，具体有多

① 孙斗焕1916年赴日本明治大学留学，1919年4月流亡上海，1920年左右接受社会主义思想，通过社会主义运动致力于推进民族运动。另一方面，孙于1923年进入陕西第一军讲武堂接受军事训练，此后一直积极投身于通过武装斗争推动独立运动。黄埔军校成立以后，进入该校并毕业，1926年初进入校长办公室工作。关于孙斗焕的经历，参见韩相禱《孫斗煥의抗日民族主義探索과民族運動觀(孙斗焕探索抗日民族主义与他的民族运动观)》，首尔《韓國民族運動史研究》36(2003)，第181—195页。

② 《不逞鮮人呂運亨ノ廣東滯在中ノ言動(1926.4.20)》，《國外抗日運動資料：日本外務省記錄(國史編纂委員會 韓國史)》，Database, <http://db.history.go.kr/>。

③ 《在上海總領事代理田島昶給在廣東總領事代理清水亨的電文(1926.2.10)》，《國外抗日運動資料：日本外務省記錄(國史編纂委員會 韓國史)》，Database, <http://db.history.go.kr/>。

④ 裴京汉：《蔣介石研究－國民革命時期の軍事・政治の擡頭過程(蒋介石研究：国民革命时期的军事政治的抬头过程)》，首尔，一潮閣1995年版，第25—37页。

⑤ 金正賢：《第1・2次國共合作期の韓中連帶活動－黃埔軍官學校人脈を中心으로－(第一、二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韩中连带活动——以黄埔军官学校的人脉为中心)》，光州《歷史學研究》46(2010)，第128—130页。

⑥ 关于辛亥革命阶段的中韩互助，参见裴京汉《辛亥革命と韓國－金奎興の廣東에서의活動を中心으로－(辛亥革命与韩国——以金奎兴在广东的活动为中心)》，首尔《歷史學報》212(2011)，第303—304页。

⑦ 根据日本方面的情报，金元凤是在1925年8月到达广东后入学黄埔军校的，预计1926年9月毕业。《廣東地方不逞鮮人ノ動靜ニ關シ報告ノ件(1926.1.25)》，《國外抗日運動資料：日本外務省記錄(國史編纂委員會 韓國史)》，Database, <http://db.history.go.kr/>。

⑧ 入学黄埔军校的韩人学生的人数与名单，参见《第三期同学姓名籍贯表》、《第四期同学姓名籍贯表》，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37—587页；韩相禱《韓國獨立運動と中國軍官學校(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军官学校)》，首尔，文知社1994年版，第148—159页；金正賢《第1・2次國共合作期の韓中連帶活動－黃埔軍官學校人脈を中心으로－(第一、二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韩中连带活动——以黄埔军官学校的人脉为中心)》，第129—131页；张世胤《中國共產黨の廣州蜂起と韓人青年の活動(中国共产党在广州的蜂起与韩人青年的活动)》，首尔《史林》24(2005)，第221—224页。

少人是由吕运亨介绍入学的虽无从得知,不过确有一部分韩人学生曾表示是通过吕运亨的介绍才入学黄埔的。^①从吕运亨访问广州不久之后第四期生韩人学生大幅增加这一事实看来,通过其介绍入学黄埔的学生应不在少数。

众所周知,这些黄埔军校的韩人学生在毕业后大都参加了1926年7月开始的北伐,并且据说这些韩人青年军人多数牺牲在北伐战争中。^②参加北伐的具体韩人名单虽已无从考证,但韩人确实对北伐战争的参与和牺牲装点了这场“中韩互助”,而其背后也自然有着吕运亨的活动与贡献。

除促成韩人入学黄埔军校以外,吕运亨在广州推进的另外一件事,便是组织在广州地区的进步韩人青年成立共产主义青年团,即CY。如上所述,吕运亨在1920年5月加入了在上海成立的韩人共产党,而之后韩人共产党因莫斯科援助的分配问题产生了激烈的内讧,分裂成为上海派和伊尔库茨克派(吕运亨本人属于该派),此后韩人共产党组织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支离破碎的状态。因此,1925年以后吕运亨便积极地投身到中国革命中,并以共产国际为中心开展活动。吕运亨在广州成立了融合各派系的统合组织CY^③,这也是其呼应共产国际立场的一种反映,即将1925年4月根据共产国际的方针在韩国国内成立的朝鲜共产党视为正统并为其在各地成立统合组织。

在广州成立的CY组织的全貌究竟如何虽不得而知,但当时在黄埔军校与中山大学学习的具有进步立场的韩人青年与一部分中国共产党党员都曾加入,吕运亨被推选为CY组织的会长,广州地区韩人领袖孙斗焕、金铁男、朴永权也被选为干事。^④作为共产党下属组织的CY组织的创立,与胡志明在广州创立的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组织,可以被认为具有相同的形态和相同的目的。因此,吕运亨与胡志明在相同时期、同在广州、同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分别在为创立韩国与越南的共青团做着阶段性的准备工作。^⑤

吕运亨说在参加完二中全会返回上海的几个月后他再次访问广州,其目的是为支援北伐军出征。^⑥根据这一说法,访问时间应在1926年6月前后。但是有趣的是,这一时期关于吕运亨访问广州的日方情报资料却显示,吕运亨是为将在上海的韩国临时政府迁至广州而去做事前调查的。^⑦由于临时政府因财政困窘和内斗严重正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所以动议将其迁至国民革命的中心地并且有大量韩人活跃活动的广州是极有可能的。报告还显示,此次访问广州期间,吕运亨在共产国际的同意下还曾试图成立朝鲜共产党广东支部,并为此曾与在当地的孙斗焕、金铁男、金元凤进行

① 作为第五期生入学的张兴称自己是通过吕运亨介绍入学的。国家报勋处编:《獨立有功者功勳錄》5(1988),第768页;韩相禧:《韓國獨立運動と中國軍官學校(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军官学校)》,第155—156页。

② 金正贤:《第1·2次國共合作期の韓中連帶活動—黄埔軍官學校人脈を中心として—(第一、二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韩中连带活动——以黄埔军官学校的人脉为中心)》,第132—133页。

③ 孙斗焕称当时广州地区韩人共产党员分为国际派、伊尔库茨克派、上海派三派。参见《廣東二於ケル呂運亨ノ行動二關スル件(1926.2.6)》,《國外抗日運動資料:日本外務省記録(國史編纂委員會 韓國史)》,Database,http://db.history.go.kr/。

④ 参见韩相禧《孫斗煥の抗日民族主義探索と民族運動觀(孙斗焕探索抗日民族主义与他的民族运动观)》,第198页。

⑤ 可以肯定,在广州成立CY曾得到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协助。根据日本方面的情报资料,吕运亨在广州曾受到中国共产党的盛大欢迎,并做了题为《今后东洋的共产主义宣传方法》的演说。《廣東二於ケル呂運亨ノ行動二關スル件(1926.2.6)》,《國外抗日運動資料:日本外務省記録(國史編纂委員會 韓國史)》,Database,http://db.history.go.kr/。

⑥ 《(檢察)被疑者訊問調書(第3回,1929.8.2)》,《夢陽呂運亨全集》第1卷,第484页。吕运亨称此次访问的时间是1926年4月。

⑦ 参见《不逞鮮人呂運亨來廣ノ目的並ニ其動靜二關スル件(1926.7.6)》,《國外抗日運動資料:日本外務省記録(國史編纂委員會 韓國史)》,Database,http://db.history.go.kr/。

过会谈。^① 这与吕运亨在1926年1月访问时在CY组织上倾注大量气力是有共同背景的。

此后吕运亨再次接到鲍罗廷的召唤电报是在北伐军占领长江中游军事重镇武昌后不久的1926年11月。^② 吕运亨访问武昌的具体日程不得而知,据本人说,他在武昌停留了40余日,是在1927年初返回上海的。根据这一说法^③,吕运亨很可能是在11月底或12月初赴武昌,在1月初左右返回上海的。吕运亨在武昌期间,参加了12月10日在武昌、11日在汉口举行的国民政府欢迎大会并与鲍罗廷等一起发表演说。^④ 根据报道欢迎大会的报纸新闻,12月9日离开九江的鲍罗廷与国民政府委员们于10日上午11点到达武昌,于下午2点召开武汉各界欢迎大会,有10万群众云集。^⑤ 次日在汉口召开欢迎大会,较武昌大会更为盛大,现场云集30万人,鲍罗廷、宋庆龄、徐谦、陈友仁、孙科、唐生智等国民政府要员都参加了大会并顺次演说。^⑥ 虽然在武昌和汉口演说家名单中找不到吕运亨的名字,但是在“此外众多演说家”中应包括吕运亨。

吕运亨在武昌做的可以确认的另外一件事情,是与鲍罗廷商讨韩人志士对国民革命即北伐的具体支持方案。当时在上海的韩国临时政府方面也曾考虑过召开韩人大会(国民大会)商讨支持中国革命的方案,所以吕运亨认为无论在上海还是在汉口召开支援北伐的韩人大会,各地的韩人都会积极响应。为此,吕运亨向鲍罗廷提出5万元的经费支持,并得到了应允。不仅如此,鲍罗廷还说会将这一计划通知国民政府,并嘱咐韩国临时政府须尽快向国民政府提交计划书。此后,吕运亨在返沪后向临时政府外长赵素昂提请准备该计划案,临时政府方面旋即准备并在1927年4月完成计划书后由赵素昂亲自赴汉口交予国民政府。但据吕运亨说,该计划最终因四一二政变和武汉政府分共而未能实现。^⑦ 综上所述,上海韩国临时政府与国民政府间已经探讨过比韩人在广州以黄埔军校为中心进行的参与并支持国民革命更为系统化的、扩大到全国规模的方案。该方案虽然因国共合作的破裂而未能实现,但是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为中韩互助与“反帝连带”曾经做过何等努力的探索。

1927年1月返沪的吕运亨积极参与了北伐军进入上海之前在上海开展的第三次武装起义与临时市政府的建立活动,在与国民党代表钮永建、共产党代表瞿秋白、俄罗斯顾问等一起讨论武装起义方面出力甚巨。^⑧ 在蒋介石军队对主导第三次武装起义的中国共产党和上海总工会进行残忍镇压的四一二政变中,吕运亨被逮捕并险些被判处死刑。四一二政变后,国民革命的基础国共合作与联苏政策宣告破产,吕运亨的共产国际活动也面临危机。政变后,吕运亨仍继续从事为塔斯社翻译并寄送中国新闻报道的工作,但是自主管此事的苏联驻上海副领事维特于1927年11月回国后

① 参见《不逞鲜人吕运亨来沪之目的並二其動靜二關スル件(1926.7.6)》,《國外抗日運動資料:日本外務省記錄(國史編纂委員會 韓國史)》,Database,http://db.history.go.kr/。

② 北伐军占领武昌是在10月10日,鲍罗廷一行迁都武汉于11月16日离开广州(张秋实:《解密档案中的鲍罗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42页),由此可推知,鲍罗廷要吕运亨前往武汉的电报应该是在自己离开广州的11月16日前后发送的。

③ 《(警察)被疑者訊問調書(第3回,1929.7.20)》,《夢陽呂運亨全集》第1卷,第427页。

④ 吕运亨记得自己演说的日期是12月12日。《(警察)被疑者訊問調書(第3回,1929.7.20)》,《夢陽呂運亨全集》第1卷,第427页。

⑤ 《要聞:中央國府文員抵武汉詳情》,《廣州民國日報》,1926年12月14日,第2版。

⑥ 《三十萬民眾歡迎政府委員》,上海《民國日報》,1926年12月14日,第2張第1版。

⑦ 《(警察)被疑者訊問調書(第4回,1929.7.22)》,《(檢察)被疑者訊問調書(第6回,1929.8.6)》,《夢陽呂運亨全集》第1卷,第430—431、549页。

⑧ 参加第三次武装起义并指导其路线乃是吕运亨个人的说法[《(警察)被疑者訊問調書(第3回,1929.7.20)》,《夢陽呂運亨全集》第1卷,第427页],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区委关于第三次武装起义的会议记录(许玉芳、卞杏英编著:《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会议记录中却找不到吕运亨的名字。但由于相关会议记录都是用假名,所以也不可全盘否定吕运亨参会之事。对这一主题日后需要做更详细的研究。

便断了联系,吕运亨的工作也就中断了。^①此后吕运亨为谋生计,到复旦大学做了体育部的教授。1929年7月,他在上海赛马场被日本警察逮捕并被强制遣送回国。^②吕运亨15年多的中国流亡生活也至此结束。

五、结论

综上所述,20世纪上半叶韩国代表性的政治领袖之一吕运亨自1914年留学南京始,直至1929年被日本警察逮捕并遣送回韩,在中国活动了逾15年之久,期间积极参与了20年代中国的国民革命。而吕运亨参加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的经历也为其之后“中道统合”的政治方向奠定了基础。1917年以后,吕运亨以上海为中心组织韩人为独立运动铺垫基础,而其开始倒向苏联和共产国际则始自1919年末或1920年初。吕运亨倒向苏联与共产国际的背景,是共产国际主张在弱小的殖民地国家里,共产主义革命须先与民族解放运动势力合作的联合阵线战略,他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欲推动韩国共产革命则须将韩国临时政府作为合作对象的建议。

1925年以后吕运亨积极参与中国革命也是共产国际要求和安排的结果。当然,吕运亨倾力参与中国革命而非韩国独立运动也是有其他原因的,即当时以临时政府为中心的韩国独立运动财政拮据,以及派别分化和内斗等所暴露出的巨大的局限性等。相对于由于困难重重而停滞的韩国独立运动,吕运亨认为投身于更具成功可能性的中国革命中,待其成功后再由其帮助韩国的独立与革命,这样成功的希望会更大。吕运亨的这种期待其实是辛亥革命以后韩人志士们对中国革命所表现出的共同立场。

吕运亨对国民革命的支持活动通过其在1926年1月参加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全体会议上进行演说可以得到很好的确证。1月14日,吕运亨与越南的胡志明以及一位印度革命家在全体会议上同台演说,其内容较为详尽地保存在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议记录中。吕运亨在演说中首先提及与中国革命最高领袖孙中山、苏联革命最高领袖列宁的私交,表达了自己对中国革命和苏联革命的亲近感。之后介绍了殖民地韩国的悲惨境况,并指出,要打倒进行殖民统治的帝国主义和资本家(阶级),需要处在殖民统治下的弱小民族联合起来。吕运亨表示,中国国民革命便是这种意义的“反帝连带”,因此自己才会真心地予以支持和协助。胡志明与印度革命家的发言与吕运亨大同小异,皆强调为打倒帝国主义须增强弱小殖民地国家间的联合即“反帝连带”的必要性,并主张须付诸实践。二全大会所显现的这一“反帝连带”主张在以一全大会为开端的国民革命初期阶段就被积极地提出,而为支持当时反帝运动最大战场的省港罢工,在国民党的全力支持下于1925年7月成立的被压迫民族联合会也有韩国、越南、印度等国的代表参与其中。

吕运亨为出席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而访问广州期间还做了两件事,一是会见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与其探讨了韩人学生进入黄埔军校学习的问题;二是组织正在黄埔军校和中山大学就读的进步韩人青年成立CY,即共产主义青年团。这两件事,尤其是韩人学生进入黄埔军校学习一事,不仅具有吕运亨在演说中所提及的“反帝连带”具体实践的意义,而且也是辛亥革命后推进的

^① 《(警察)被疑者訊問調書(第3回,1929.7.20)》,《夢陽呂運亨全集》第1卷,第427—428页。根据吕运亨的弟弟吕运弘的说法,四一二政变当时,吕运亨在上海闸北被国民党军队逮捕,在被押送至龙华白崇禧麾下的淞沪警备司令部的途中逃至英租界才保住了性命。(吕运弘:《夢陽呂運亨》,首尔,青夏阁1967年版,第75—76页。)但与此相反,吕运亨却声称“(当时)由于自己批评过蒋介石,宪兵队长杨虎(国民革命军特务处)将自己逮捕,因此自己才逃至租界躲藏了一个月”。《(檢察)被疑者訊問調書(第6回,1929.8.6)》,《夢陽呂運亨全集》第1卷,第548页。

^② 吕运弘:《夢陽呂運亨》,第83—84页。

“中韩互助”的具体实践。另外,广州地区的韩人共青团乃是隶属于1925年在韩国国内成立的朝鲜共产党在各地的共产主义统合组织,这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而成立的。吕运亨的这些活动,同当时在广州与鲍罗廷一起活动并为创立越南共产党而成立基础组织的胡志明的活动几乎是一致的。由此可见,1925年以后吕运亨参与中国革命很有可能是受命于在上海的共产国际东亚秘书部。

1926年11月接到鲍罗廷电报的吕运亨前往被北伐军占领的武汉会见鲍罗廷,并且在国民政府委员们为欢迎北伐军进城而召开的市民大会上做了祝贺演讲。当时的演讲内容现在虽无从稽考,但估计很有可能与其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讲内容一致,即强调“反帝连带”的必要性并表达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另外吕运亨在与鲍罗廷会谈中还商定在武汉或上海召开全中国韩人大会筹划支持中国革命的方案。吕运亨回到上海后,请求临时政府外长赵素昂制定召开韩人大会的具体方案,4月初赵素昂制定好方案并直接转达给了武汉政府。然而随后爆发了四一二政变和武汉政府的分共,使得中韩互助及“反帝连带”的实践流产。吕运亨还参与了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计划的制定并翻译中国新闻报道发至塔斯社等活动,但最终由于国共分裂以及俄罗斯顾问的撤离,其支援国民革命的活动也被迫中止。

吕运亨参与国民革命的初衷,便是希望和期待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后,借助中国支持而实现韩国独立与革命的成功。由此可见,对于吕运亨而言,中国国民革命并非他国之革命,而是祖国韩国之革命。从这一角度来看,作为“反帝连带”现场的国民革命同时也是同时代东亚地区处在殖民统治下的弱小国家独立运动的阵地。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展开的东亚各弱小国家间的这些“反帝连带”经历,对于今日我们探索东亚和平与共同繁荣仍具有十分深刻的意义。

[作者裴京汉,韩国新罗大学教授,釜山,617-736,khbae@silla.ac.kr]

(责任编辑:徐秀丽)

· 书 讯 ·

《近代中国的不吸纸烟运动研究》

刘文楠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3月出版,26.3万字,65元

本书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考察近代中国国家与民众关系的塑造和转变。纸烟从晚清传入中国以后,迅速成为流行,至抗战前夕,已经遍布全国城乡各地。然而,近代中国的不吸纸烟运动却鲜为人知。作者根据报纸、档案、回忆录等史料,重构了晚清到民国时期三次不吸纸烟运动的来龙去脉,并详述了这三次运动的言论、组织和开展过程,将其与更大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以小见大,从局部考察整体,最后着眼于近代中国精英和政府对于民众日常生活的定义和塑造。

本书虽然从不吸纸烟运动出发,却并未限于这一主题,而是以此为线索,将政治动员、国民教育、日常生活规训、卫生观念的演进、烟草业经济发展、政府税收管理、中央地方关系、民族主义思潮等方面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体现了历史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No. 4, 2015

On the 88th Brigade and the Triangular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the Soviet Union and Korea—A Glance at the International Anti-Fascist Alliance during China’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Shen Zhihua (4)

In the latter part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rganization in Northeast China and the remnants of the Anti-Japanese Coalition there were forced to withdraw to the Soviet Union, where they accepted the Soviet Army’s support and were placed under its command. Before long, the 88th Brigade (the Training Brigade of the Anti-Japanese Coalition) was established—mainly composed of Chinese and Korean guerillas—and became a special force of the Soviet Union’s Far East Army. After the Soviet Union declared war on Japan, Stalin decided to disband the 88th Brigade. Kim Il Sung then led some of the Korean officers and soldiers of the Anti-Japanese Coalition back to Korea. They ultimately split off from the CCP organization and became a supporting force for the Soviet Occupation Army. The history of the 88th Brigade from one side reflects the subtl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International Anti-Fascist Alliance and China, the Soviet Union, and Korea in the Far East during the latter part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and the “Anti-Imperialist United Front” in East Asia—Centered on the Korean Revolutionary LyuhWoon-hyung’s Activities in China Bae, Kyoungghan (17)

From the standpoint of small, weak, colonial countries on China’s periphery such as Korea and Vietnam,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a’s national revolution with its anti-imperialist goals was a new hope. The national revolution’s concept of an “anti-imperialist united front”—the idea of jointly fighting against Japan, France and other imperialist powers that made Korea and Vietnam into colonies—indeed led Korean and Vietnamese revolutionaries to view Chinese revolutionaries as strong, friendly forces. LyuhWoon-hyung wa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Korean political leader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article will review in detail the historical facts of his participation in China’s national revolution. This is not just to faithfully restore the truth of his activities in China, but also to more deeply understand the international image of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through reviewing the truth and meaning of the “anti-imperialist united front” in all Asian nations during the period of national revolution. LyuhWoon-hyung’s original intention in taking part in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was to obtain Chinese support for the success of Korea’s revolution and the independence of Korea once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chieved success. This shows that, for LyuhWoon-hyung, the Chinese national revolution was not a foreign country’s revolution, but rather a revolution for his motherland, Korea. Looked at from this angle,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at the site of the “anti-imperialist united front” was also the site for the independence movements of the weak and small countries in East Asia under colonial rule at the time.

Changes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Anti-Imperialist Ideas and Their Influence during the First Period of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Guomindang and the CCP Li Yumin (32)

Anti-Imperialism was one of the political bases for the first period of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Guomindang and the CCP; at the same time it became the basic goal of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In the early period, the basic content and main goal of the CCP’s anti-imperialist policies was to abolish all the unequal treaties. After the 1927 “January Third” Incident in Hankou, the CCP’s anti-imperialist policies shifted from abolishment of unequal treaties to completely eliminating the power of imperialism in China. The reasons for this change lie both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omestic revolutionary situation and the upsurge in the common people’s struggle, and also in the instructions of the Comintern. The CCP’s radical policies enlarged the anti-imperialist struggles of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but they also led the CCP into conflict with the Guomindang. Correspondingly, this influenced the pattern of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Guomindang and the CCP, hastening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process of the Guomindang’s split.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national government as quickly as possible, the Guomindang increasingly compromised in its attitude toward imperialism. Moreover, owing to conflicts over issues like leadership, worker and peasant movements, and the land movement, Chiang Kai-shek first staged a coup. Then, Wang Jingwei undertook the measure of “separating from the CCP,” and the two parties finally parted company.